

成，他們共同期望當然是災後重建，對同屬「大埔里社區」的暨大師生，個個年輕力壯，沒有傷亡且具專業素養，在埔里人最需要時棄埔里不顧，責難在所難免。

這是典型的小社區對大社區的衝突，暨大的受教權及生存權不見容於「大埔里社區」的「共善」（急難救助，災後重建），當小社區甚至個人的權利或利益，和大社區的「共善」或「公共利益」發生衝突時，如何化解？或者大社區的共善如何兼顧小社區的權利，是台灣社區營造過程經常遭遇的困難，也是李教授文中所提「自由主義」及「社群主義」的爭論點。這衝突的根本原因乃是社區共識如何形成，以埔里的例子來看，在大埔里的共善或共識形成過程，有否經過全體暨大師生以及埔里人平心靜氣地溝通協調過，或只是震後荒亂中「想當然耳」的意見，大家站在自己觀點，你一句我一句透過媒體相互開炮，加上總統大選當前，民意代表攪和，大小事件泛政治化考慮，共信全無，才演變成當前意氣用事，短兵相接，難以收拾的局面。

反省台灣社會解嚴後，社會力在長期的威權統治下逐漸釋放，一九九三年文建會運用國家資源，大力推動美其名由下而上的「社區總體營造」，恰好遇到這股社會轉型的浪潮，於全台各地激起莫大迴響，宛如社會運動般欲罷不能。李教授觀察到大部分社區營造案例推動至今，皆遭遇瓶頸，我認為這瓶頸乃在於社區共識的形成。埔里暨南大學便是最

《回應》

台灣社區主義的困境

——共識形成困難

◎ 陳錦煌

李教授從暨大復學案為例來談台灣現階段社區主義的困境，我也想由此案介入，談社區工作最常遇到的小社區與大社區的衝突，形成原因，及解決之道。

討論上，可以將暨大校園及其師生教職員看成暨大社區，埔里鎮及其住民是埔里社區，暨大及埔里兩社區合組「全埔里大社區」，各有其領域、住民、住民間的關係網路，及社區願景等。暨大社區剛成立不久，師生來自全省各地，除了少部分住在埔里的教職員，和埔里生活關係不多。地震發生後，暨大社區為了大部分住民的生存權及受教權決定暫離埔里，埔里社區則死傷慘重，急需外援，因為「大埔里社區」絕大部分由埔里居民組

好的例子。

如何將個人（或小社區）的權利或利益整合成大社區的共善或共同願景，不管透過法律架構（如公民投票法），或突破「物競天擇、適者生存」生物進化論，皆是解嚴後台灣人民歡喜當總統頭家時必先學習的科目。我們經常只會享受權利，要求權利，而忘了該盡的義務。我們常常把問題拋給人家，拋給政府，忽略了我們該負責的部分。這是台灣社區營造共識過程的最大困難。其他如好面子，為反對而反對引起的溝通困難；或缺乏互信，對談好比雞同鴨講；或泛政治化考慮，不管提什麼好意見都是派系作祟等等，在在均顯示我們的民主素養還在幼稚園階段。居民民主素養不足是現階段台灣社區營造無法突破的主要原因。

然而，我們觀察受到傳統中國思想影響不小的日本社會，為什麼他們的社區理念、社區營造會如此出色？日本明治維新以後開始全盤西化，固然比台灣社會學得久學得深廣，但是，更重要的是日本社區營造自始便建立在獨立完整的國家認同基礎上；反觀台灣的社區，從明清的海外邊陲，日據的殖民剝削，到國民黨的威權統治，台灣人什麼時候曾經以社區生活的主人來參與營造？從不管到管太多，歷史上沒有一刻被好好尊重過，怎可能學會尊重別人，相信別人，進而願意和別人溝通協調以產生共識。社區生命共同體如果不能

建立在國家生命共同體的基礎上，社區共識是易變的。

解嚴後，社區居民脫離各式政治箝制，開始學習當社區主人，建立社區公共討論的空間。從個人利益爭奪到社群共善的維護，社區其實是最好的演練學習場所。若學校也開始重視群我教育，培養民主素養，學校社區化；讓孩子成長過程學習如何尊重他人，如何溝通協調，如何開會面對不同意見，相信台灣社區營造不久即可突破瓶頸，建立共識，落實社區主義於日常生活。